

塑造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

□ 罗建波 杨 云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我们要准确把握世界发展大势，深刻认识国际环境变化带来的新机遇新挑战，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塑造和用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不断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开创新局面。

从两个大局塑造重要战略机遇期

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也是世界之中国。中国与世界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同国际社会的互联互通变得空前紧密，我国对世界的影响、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在不断加强，世界对我国的影响、对我国发展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两个大局的重要判断为我们准确认识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提供了基本遵循，为我们思考中国的历史方位和世界坐标提供了基本参照。

塑造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需要准确把握世界大势，顺势而为，乘势而上。着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既要看到国际形势加速演变带来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也要从中长期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看到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看到一大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引致国际秩序正在发生富有历史意义的大变化。着眼中国自身发展，我们更要自信地看到，中国自身发展本身就是推动国际秩序积极变化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也是从根本上决定中国外部环境的最重要的因素。中国发展仍然处于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最大的机遇就是自身不断发展壮大。

塑造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耐心，最重要的还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面对内外环境变化，特别是某些外部不利因素呈现出的长期性复杂性，我们要凝聚国内共识，加快推进改革开放，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加大科技自主创新。外部形势越是复杂，越需要战略定力，越需要着眼大局、放眼长远，聚力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要清醒认识到，大国竞争从根本上比的是科技创新，比的是制度优势，比的是治理能力，比的是政治韧性。

塑造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需要坚持底线思维，弘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当前世界进入变革动荡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特别是，此次全球疫情未能开启大国合作新时代，相反大国围绕核心产业竞争和意识形态较量呈现显著升级，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新焦点。从世界历史进程来看，新兴大国在实现发展过程中可能面临“崛起困境”，其中重要方面是面临来自守成大国及其同盟国的遏制和围堵。对此，我们要有前瞻预判，做好充分的心理和战略准备。

从全球维度塑造中国外交全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不断完善外交布局，更加系统谋划、全面协调、整体推进与周边、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互利合作，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推进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全面提升。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以“亲诚惠容”理念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创造性地提出推动构建均衡稳定、大国关系新框架，创造性地提出秉持正确义利观深化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创造性地提出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伴随中国的快速发展及其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显著变化，中国日益以一个世界大国的姿态屹立于世，中国外交更富全球视野，更具战

略远见。我们要立足亚太，放眼全球，秉持大思维、大视野，在世界大棋盘上思考中国外交布局 and 进取方向。

中国外交布局最为创新之处，莫过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及稳步推进。对中国而言，“一带一路”在持续提升向东开放水平的同时，显著加快向西开放的步伐，构筑起方位更加平衡、领域更加宽广、时空更加开放、内外联动更加紧密的对外开放格局。其目的，正是旨在实现我国东西两大方位，陆海两大区域，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两类规则的有效统筹，拓展中国在亚欧非三大洲、印太两大洋乃至全球范围的发展空间，由此实现中国对外开放格局的全面升级，助推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深入发展。从世界维度来看，“一带一路”是实现各国共同发展的合作新平台，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复苏的新动力，是增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新纽带，是新时代中国奉献给世界的重要公共产品。“一带一路”由中国提出，但成果属于全世界。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们还要讲谋略、重运筹，在国际关系大分化大重组中始终保持有利战略态势。当前亚太地缘格局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中国影响力不断上升的地缘经济格局与美国主导的地缘安全格局之间存在巨大断裂，这一裂痕仍有继续拉大的变数和可能。我们需要高度关注美日印澳四国准联盟的走向及东盟国家的相关反应，防止周边地区地缘战略压力出现显著上升。同时继续深化同周边国家的利益和情感交融，增加对地区公共产品的供给，编织起更加紧密的利益共享、责任共担、人心相通的命运共同体，不断提升在周边地区的亲和力、感召力和影响力。中国还要注重弘扬伙伴关系思维，不断深化拓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巩固战略依托，扩大回旋空间，改变和优化中国的战略处境，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舒展中国外部环境并维护全球战略稳定。中国不会搞军事同盟关系，但也需要战略上的助力。

从人类共同福祉塑造中国道义精神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世界大国。在自身不断发展的同时，需要及时向世界表达中国人对世界发展和国际秩序的愿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承担力所能及的大国责任。这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一种期待，更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一种理论和实践自觉。当前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以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为主线，在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携手世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梦”携手“世界梦”，充分展现了中国外交为民族复兴尽责、为人类进步担当的重要使命。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回答世界之问的中国方案。其理论核心是，构建相互尊重、公道正义的政治秩序，互商互谅、共享安全的安全格局，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发展前景，和而不同、包容互鉴的文明秩序，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崇高理念。其实质是中国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而提出的中国方案，是基于人类历史教训、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而描绘的世界蓝图。在人类社会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在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今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社会破解世界难题、携手共创美好未来贡献了中国智慧和力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人间正道。

中国深入参与全球治理，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发展和完善，是新时代中国外交更具大国责任和道义精神的集中体现。一如中国承诺的那样，中国在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维护国际安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全球公共卫生合作等领域贡献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力量，提供了越来越多带有中国烙印的公共产品。在2020年全球抗疫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呼吁打

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中国向受疫情影响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抗疫斗争和经济社会恢复发展提供了大量支持。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不仅更加“有为”，也更加“有位”。我们一直致力于推动既有重大国际机制的改革和完善，同时倡议或发起组建了一系列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以共商、共建、共享为特点的国际组织和合作机制。中国参与国际多边体系的努力方向，就是要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维护和拓展中国的发展利益，同时携手各国共同为国际体系建制度、立规则、定方向，推动世界更为有效地应对各种全球性问题，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长远制度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已经由国际体系的“学习者”和“参与者”，日益转向成为国际体系发展和完善的“塑造者”和“建设者”。

以强国为目标塑造中国外交能力

因应外部环境变化，小国重在应对，大国重在维护，而强国重在塑造。“应对”强调的是防御，“维护”强调的是守成，“塑造”强调的是主动运筹。在中国由大向强的关键阶段上，务求提升战略塑造能力，更加主动运筹与外部世界关系，强化外交能力建设自然是时代所需，也是当务之急。

统筹协调力。当前对外工作涉及的领域更加广泛，参与的主体更加多元，涉及的利益关联更加复杂，日益呈现出“总体外交”的特点。为全面推进新形势下的对外工作，必须加强党中央对外交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改革完善对外工作体制机制，形成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对外工作大协同局面。尤其要以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为重要抓手，有效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做到提纲挈领，纲举目张，从而实现跨部门、跨领

域、跨地区、跨内外的有机联动。战略谋划力。把握国际形势必须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中国外交要谋大势、观大局、重运筹。既要看清中长期世界发展大势，也要及时把握国际形势和中国外部环境的新变化、新动向、新特点；既要注重中国外交思想的历史传承，又要努力挖掘外交理论的创新点和突破点；既要注重中国总体外交布局的稳定性，又要善于发现外交方略新的生长点和着力点；既要保持中国外交总体谦虚谨慎的作风，又要努力打造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新作为、新担当和新气象。

战略实施力。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既要有战略上的整体规划，又要有战术上的精准发力，既要有全局层面的通盘考虑，又要有具体领域的精准突破。战略实施的顺利推进，需要实现目标、能力和手段三者之间的相互匹配，根据自身拥有的资源和能力研究如何灵活运用政治、经济、文化等具体的外交手段。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特别需要下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的先手棋，也要打好顺势而为、乘势而上的战略主动仗。

公共外交力。公共外交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塑造本国形象，改善外国公众对本国的认知，进而增进相互理解和认同。我们要善于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擅于处理好与国外媒体、国际非政府组织等的关系，同时引导和推动国内智库、NGO、媒体走出去，构筑起人心相通、情感相融的人文交流大格局。

规则塑造力。21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话语权的复兴。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需要着眼参与甚至引领重大国际制度和规则的塑造，提高在重大国际组织中的议程设置权、概念定义权、内容解释权、争议裁判权，也需要更加积极、深入参与全球性事务，为全球发展和治理问题的解决呈现中国方案、提出中国倡议、贡献中国力量，由此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崛起，是21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世界维度的重要体现，是中国成为真正意义上全球性大国的必然要求。



韩国何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 吴 漾



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韩国在1987年成为中高收入国家，随后仅用了8年时间，于1995年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那么，韩国为什么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呢？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跨越陷阱的动力

20世纪60年代，韩国抓住了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机会，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轻工业，走出导向型经济的道路，开始积累资金和技术。为了扩大出口和提高产品竞争力，政府将韩元贬值了近一半。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爆发石油危机，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致使韩国轻工产品逐渐丧失出口优势；而且，发达国家开始进行从资本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换。为了适应国际环境新变化，强化自身国家安全保障，韩国制定了“重化工业发展计划”，主导产业开始由轻工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重化工业为主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型。韩国于20世纪80年代完成重化工业建设，重化工业在制造业中的占比过半，其中的钢铁、造船、机械、石化等产业取得了突出的成绩。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韩国不失时机地提出了“科技立国”的发展战略，取代了之前的“贸易立国”，产业发展的重心开始向知识密集型产业

迁移。20世纪90年代，韩国迫于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压力，开始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包括计算机、半导体、电子机械、航空航天、信息技术等产业。通过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了经济持续增长。为了快速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韩国在技术引导、企业经营、资本引进三个方面采取了持续改良的措施。

一是非常重视科技发展。韩国国土面积小，资源匮乏，重度依赖国际市场，因而只有发展科技，才能提高国际竞争力。1967年，韩国成立了科学技术处，管理全国的科技发展，同年颁布了《科学技术促进法》，为之后的科技发展奠定了基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韩国不断增加R&D经费投入。1980年，韩国的R&D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为0.56%，至1995年已上升至2.4%，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投入强度。企业作为R&D经费来源的主体，通过加大研发投入，提高了自身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从而获得了产品高附加值的高额利润。

二是大力扶植私营企业。韩国的经济增长和战略实施主要靠私营企业来实现。韩国政府不但大力扶植私营企业，与企业共同承担风险，还给予企业必要的经营自由，让企业充分自主创新。尽管随着重化工业的发展，韩国的财阀企业不断膨胀，产生一系列如垄断、贫富差距加大等弊端，但是，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法律措施，强迫大企业面向社会开放，强调企业的责任和义务，将企业的活动严格限制在合法范围内。

三是合理引进外资。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对韩国的援助逐渐减少。为了发展经济，韩国一方面通过贷款等手段积极引进外资，另一方面采取严格的监管。1960年韩国的投资率为11.5%，1980年升至31.61%。韩国实

行低工资制来吸引外国资本家，使之获得廉价劳动力产生更多利润，进而扩大直接进行投资。与此同时，政府对投资项目进行了严格限制，须是服务于出口或是国内十分缺乏的产品，以更好地保护本国工业。

均衡的社会分配是跨越陷阱的稳定器

韩国基尼系数由1970年的0.36降至1995年的0.31，收入差距始终处于相对合理的水平。政府通过加强税收、改善社会福利、“新村运动”等措施避免了财富的高度集中和分配不均。

一是进行税收改革。20世纪80年代开始，韩国通过税收对收入分配进行调节。多次提高个人所得税免征额，减轻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同时提高高收入者的税率。增加对财产、遗产、赠与的征税，特别是提高了对不动产的征税，以打击不动产投机行为，稳定地价。

二是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民众对社会福利需求的不断增加，韩国政府开始重视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1980年，全斗焕上台后提出“建设福利社会”的口号，并在宪法中将发展社会福利列为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这一时期，韩国出台了全民医疗保险、国民福利年金法、最低工资法等一系列相关制度，缩小了收入差距。韩国的社会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也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1%上升至1990年的3%。

三是开展“新村运动”。韩国是人均耕地面积最少的国家之一，自然灾害较多，农业发展空间有限。伴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大量劳动力涌入城市，造成城市资源的紧张。韩国的小农土地制度虽然具有局

限性，但它既可以向城市输送人才，又可以吸收城市过多的人口。韩国政府于1971年发起了“新村运动”。这次运动是工业反哺农业，政府通过投资将大量资金投入农村。“新村运动”动员范围广、持续时间长，通过在农村开展各种切实可行的项目，例如修路、盖房、拉电网、推广水稻等，充分发挥了农民的自主性和积极性。“新村运动”最直接的结果是改变了农民的精神面貌，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数据显示，韩国农民的人均收入从1970年的10万韩元增长至1980年的100万韩元。这为缩小城乡差距、缓解社会矛盾起到了重要作用。

重视教育是跨越陷阱的人力资本基础

韩国自古受儒家文化和科举制度的影响较大，十分重视教育。韩国政府不断增加对公共教育的投入，1961年教育经费占政府预算的15.2%，至1998年已经增长到23.3%。根据世界银行统计，1970—1979年，韩国教育公共开支占GDP比例年均2.79%，1980—1989年，增至年均3.68%。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重点产业是重化工业，教育方面也侧重于中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培训的技术人才直接服务于产业发展的需要。20世纪80年代，韩国逐渐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专业化的人才供给；同时推进产学协作，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让企业和职业学校合作互利。韩国的教师待遇较高，教师队伍稳定且素质高，为教育事业打下了有力基础。韩国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和需求不断调整教育政策，每个时期的教育发展水平总是高于当时的经济水平，为社会各个行业提供了充足、多元化、高质量的人力资源，为

韩国现代化建设的持续推进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人力资源支撑。

相对稳固的政府是跨越陷阱的保障

韩国的经济起飞是自朴正熙上台后开始的，即“先政治变化、再经济发展”。1961年朴正熙发动政变，韩国结束了之前的政治动荡，进入了政治环境较为稳定的时期。在朴正熙执政期间，高效务实的治理水平和执政能力为韩国的经济起飞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经济发展第一”成为首要国家方针目标。韩国政府专门成立了经济企划院，与各个职能部门直接对接，制定、推行、监督、评价各项经济计划。政府还为企业提供技术、资金等方面的全力支持。同亚非拉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政府过度依赖于私营企业主、宗教团体等各方势力提供资金不同，韩国政府当时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战后日本的赔款、欧美的国际贷款。这使韩国政府拥有很大的自主性，相对来说不用过度费心权衡各方利益得失，能够迅速推行并及时调整各种政策方针。政府主导型的经济模式让整个韩国变为一个大型的生产机器，韩国由此实现了经济起飞，被誉为“汉江奇迹”。其后全斗焕和卢泰愚在执政期间也保持了国家政策方针的连续性，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升。

总之，通过实施以上有效举措，韩国实现了现代化的起飞，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并为现代化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当然，韩国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其中比较突出的便是财阀集团的负面影响。财阀集团在经济上明显的垄断性、在政治上一定的操控性以及在社会上的某种撕裂性，为国家稳定发展埋下了隐患。